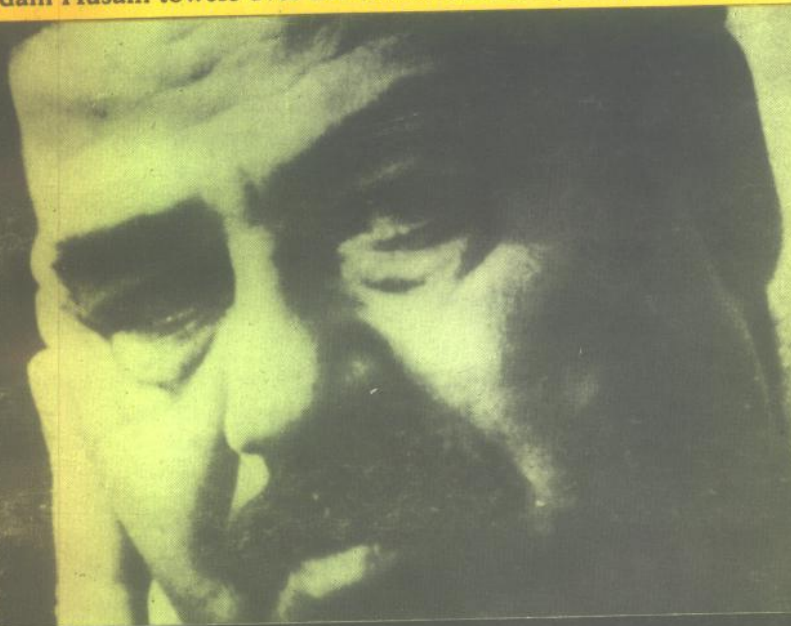


萨达姆的伊拉克



The Leader Syndrome

Portraits of leaders signify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But these are rarely as big and varied as in Ba'thist Iraq. A large painted cutout figure of Saddam Husain towers over the entrance of every Iraqi village; often



〔美〕萨米尔·哈利勒 著

汤玉明 李贵仓 胡宗锋 杨纳让 译

萨 达 姆 的 伊 拉 克

[美] 萨米尔·哈利勒 著
汤玉明 李贵仓 译
胡宗锋 杨纳让

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根 据
Republic of Fear
Saddam' s Iraq
Hutchinson Radius
1990 年平装本
译 出

萨达姆的伊拉克
[美] 萨米尔·哈利勒 著
汤玉明 李贵仓 译
胡宗锋 杨纳让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10.25 印张 230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5604-0222-4/D·12 定价:4.20 元

(限 国 内 发 行)

出 版 说 明

美国出版的这部著作对中国人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当今世界新闻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和他领导的伊拉克共和国具有参考价值，故我们将其翻译出版。书中的描述、分析及观点难免偏颇，望读者注意鉴别。

目 录

出版说明

第一章 暴力的机构	(1)
秘密警察.....	(1)
国家军队	(21)
复兴党民兵	(29)
武装力量总数	(34)
复兴党民兵总数	(34)
国家军队总数	(35)
警察总数	(38)
小 结	(40)
政党与国家	(41)
第二章 恐怖的世界	(47)
此起彼伏的“间谍”案	(49)
新的恐怖	(60)
残忍与权力	(69)
清洗奇观	(71)
第三章 复兴党与群众	(74)
思想和组织	(74)

	年轻人的重要性	(78)
	群众教育运动	(85)
	妇女的地位	(90)
	发展与自由	(94)
	落后与暴力	(98)
	思想的退化	(101)
	心理防御体系的建立	(106)
第四章	权 威	(112)
	大权独揽的领袖	(112)
	复兴党的权威	(127)
	权威与道德	(132)
	权力的源泉	(134)
	权力源泉的未来	(141)
	塑造新的阿拉伯人	(142)
	再论政党与国家	(146)
	结 论	(148)
第五章	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拉克	(150)
	胡斯里与新道德	(153)
	通往纪律之路	(160)
	军队与亚述人悲剧	(166)
	结 局:1936—1941	(174)
第六章	复兴主义的形成	(183)
	创始人及初期事件	(183)
	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	(189)
	1943年7月的声明	(192)
	民族特征与伊斯兰教	(199)

	复兴党思想的一致性·····	(203)
	世俗主义还是教派主义·····	(210)
	世俗主义·····	(211)
	教派主义·····	(213)
	反阿拉伯主义·····	(218)
	建立组织·····	(222)
	领导原则和党的组织·····	(225)
	复兴主义与共产主义·····	(228)
第七章	伊拉克复兴主义的合法化·····	(232)
	一则自白·····	(232)
	全国行动宪章·····	(235)
	政治的终结·····	(239)
	从阶级到群众:1958—1968 ·····	(240)
	伊拉克共产党·····	(244)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247)
	观念的转变·····	(250)
	帝国主义·····	(253)
	社会主义·····	(255)
	自 由·····	(257)
第八章	最后的灾难·····	(262)
	罕见的大战·····	(263)
	战争起因面面观·····	(266)
	卡迪西亚·萨达姆之战·····	(276)
	毒气战与人海战·····	(284)
	并非结尾的结尾·····	(293)

附录 1 大事记 (300)

附录 2 1968 年以来被清洗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名录
..... (311)

第一章 暴力的机构

秘 密 警 察

撒利姆正要坐下来用餐，突然听到敲门声。他开了门，有两个人站在外边。他们没有进屋，也没有作自我介绍，径直查证撒利姆的身分，然后客气地请他们走一趟，说有一些问题需要他回答。撒利姆的妻子大声询问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做了什么错事，等等。撒利姆故作镇定，似乎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他安慰妻子不要担心，然后走出屋，轻轻地拉上门，把妻子关在屋内，跟两个人上了车。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天气并不热，但他却感到手心冒汗；他也不饿，但肚子却空荡荡的。他们的车在国家内部安全局设在当地的总部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 70 年代初期的事了。当时，巴格达被分成许多安全区。在某些区域内，可疑的居民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另一个区域居住。这些安全区内设有安全总部，时刻监视着安全区内和安全区之间的一切活动。许多初次访问巴格达的人都会感到意外：有人竟询问他们是否在傍晚时分拍摄萨达姆的出生地底格里斯河，是否有其它类似的冒

犯行为(伊拉克出售照相机,但没有内政部颁发的使用许可证,一切拍照都会受到怀疑)。一些安全区内的建筑物的顶部藏着摄像机;公共场所、雕像、主要的交通要道、交叉路口和环形路口都装有摄像机。这些摄像机为安全总部形成了严密广阔的图像监视网。撒利姆被带进这样一幢大楼内。

他记得等了好长时间。他不知为什么被召到这里来,只是感到越来越害怕。最后他被带进一间巨大的办公室,屋内众多的监测器和令人目眩的闪光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装置究竟是为了监听拍照还是为创造恐怖的气氛,撒利姆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给撒利姆端来茶,谈话开始了。从外表上看,对方身居要职,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但撒利姆不知道他的姓名。这位要人看了看一些文件,然后问几个月以前的某一天他到哪里去了。撒利姆说他记不清了。对方给他列出几个汽车牌照号,他认出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车号。对方接着问了许多与日期和车号有关的问题,撒利姆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最后他才弄明白对方想知道那天他是否上班去了,因为他们知道他总是开车上班的,但那天他的车却放在家里。

他这才恍然大悟。几个月前,他腿部骨折,卧床不起。伤势好转后他的表弟每天早晨开车接他上班,孩子上学由别人来接送,妻子也调整了日常安排。他在陈述这一切时显得局促不安,口齿不清。不过,对方并没有在意。事实上,对方没有感到意外。接着,对方问了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询问就结束了。撒利姆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

那位重要人物要求撒利姆和他的全家在10天内将衣物、家具等一切东西搬到另一住宅去,搬完后将原住宅的钥匙交到安

全总部办公室，并为新住宅登记注册。对方还告诉撒利姆，等他们把他所讲的一切调查证实后，再与他联系。当他进一步询问为什么时，对方不仅拒绝回答，而且有些恼怒。他被带出大楼，送到自己的家中。

撒利姆按要求搬了家，并把钥匙送到安全总部办公室。几个月后，他接到安全总部的电话，说他可以回到原住宅居住，让他来总部办公室取钥匙。

像上述这种不出示任何官方证件的传讯和审查屡屡发生。撒利姆从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以后，也没有真正在意，全当碰上了倒霉的天气或自然灾害。

在撒利姆这样的平民百姓看来，在伊拉克这块土地上，秘密警察就像魔鬼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但是，类似秘密警察的机构却不为人所知，论述 1968 年以后复兴党的政权方面的书籍都不敢提及类似的机构，但公众早就感受到了至高无上、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组织的存在。它们体现着伊拉克政治的本质。

从 1973 年未遂的政变、1974 年复兴党的《政治报告》、官方对 1979 年有关文件泄密事件和驻外机构的变节的报道、一些局外人的观察、复兴党成员的失言以及流传的有关人士的经历中可以看出秘密警察的阴影。此外，复兴党情报系统的一位负责人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也提到了秘密警察的存在。政府出版了一些关于公民行动的规定等法律条文。除此以外，根本没有介绍有关警察机构的职能和目的的书籍和材料。在伊拉克的君主政体时期，曾公布过一次有关警察机构的统计资料，但这次统计既包括交通警察又包括实施镇压的组织机构。1968 年复兴党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以前，伊拉克的警察系统与

今天的不大相同。

从有关的信息材料来看，我猜想撒利姆在 70 年代末碰到的那个机构起源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支部的一个特别机构。该机构是 1964 年到 1966 年期间成立的秘密组织，其成员都是从精通情报业务、具有忠诚信念的人中严格筛选出来的。在 1968 年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战斗中，这些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特别机构从一开始就是以复兴党为主的权力基地，受复兴党军事领导人的操纵。1963 年，复兴党的部分军人发动军事政变，赶走了复兴党国民警卫队，推翻了复兴党政权。叙利亚也发生了同样的军事政变。这些政变使阿拉伯复兴党组织损失惨重，四分五裂。1964 年，在复兴党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的提携下，萨达姆·侯赛因被选进复兴党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这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的最高决策机构。萨达姆的任职标志着伊拉克复兴党的新开端，因为他是秘密警察组织的创始人；在他的监督下，警察组织逐渐发展成复兴党再次执政以后的那种极其复杂、秘密的机构。

1969 年，萨达姆任命纳迪姆·卡扎尔为国家内部安全局局长。此人冷酷无情，阴险狡诈。他在 50 年代上大学时就加入了复兴党，后来逐渐成为党的实权人物之一。1963 年 2 月，复兴党第一次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同年，政权又被党的部分军人推翻。在复兴党短暂的执政期间，卡扎尔犯下了种种暴行，得了个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恶名。他喜欢亲自审讯抓来的人，嗜好在被抓的人的眼睛里熄灭燃烧着的香烟。

在卡扎尔的领导下，秘密警察酷刑折磨、秘密处死的人达几千人，这些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库尔德人。例如，伊拉克共

产党的一个支部曾发布一个公告，列出了 441 位“魂归天堂”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卡扎尔喜欢暴力审讯，他手下的人曾两次密谋刺杀库尔德人的领袖穆拉·M·巴拉萨尼。这两次谋杀恰恰是在复兴党于 1970 年 3 月份与库尔德人签订了自治协议以后不久谋划的。根据这个协议，复兴党将给库尔德人带来和平和自主权。

但这位秘密警察头子的下场可不怎么好。1973 年 7 月，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1968 年以来伊拉克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主持了一个简短的法庭审判，判处卡扎尔和其他 35 人死刑。政府并没有详细解释处决他们的原因，事实真相被掩盖了。据说卡扎尔筹划谋杀伊拉克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谋杀失败后，他把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扣起来作为人质，与他的一位亲信带着人质朝伊朗边界逃去，但未逃到边界就被追捕者包围了，他开枪击毙了两位部长。卡扎尔事件引起了党内的一场大清洗运动。

1974 年复兴党的《政治报告》是该党统治的基本准则。不同寻常的是，该报告对复兴党过去的工作作了诚实的评价，对秘密警察头子卡扎尔作了批评：

国家安全部门虽然在党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努力下得到了加强，但它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庞大臃肿的机构。在前几届政府中，国家安全部门对党和其它民族运动采取欺骗手段，形成了一种变态心理。所以，要改变这种状态，使其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绝非易事。在过去一段时期内（1968—1973），该部门犯有严重错误，败坏了党的声誉，影响了党的政策在各个领域的实施……这个

令人敏感的部门在行动上放任自由，缺乏严格谨慎的控制和约束，这里面也有领导的责任。该部门的一些官员滥用党对他们的信任，甚至图谋推翻党，1973年6月30日的阴谋就能说明这一点。这伙人肆意篡改党的政策，几乎使党丧失了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卡扎尔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复兴党的政权。此外，国家安全部门的“变态心理”日趋明显。复兴党大清洗以后不久，一连串奇怪的犯罪案件接踵发生。这些案件像军事政变一样使复兴党乱了阵脚。复兴党曾经引以自豪的是，巴格达的犯罪率呈下降趋势；紧急警察能够在几分钟内到达市内的任何地方。这一自信被接连发生的入室抢劫杀人案打得粉碎。作案者是一个名为“刀斧手”的人。他组织了一个杀人团伙，其中有过去在卡扎尔手下供职的秘密警察成员。在法庭上，该团伙供认，他们能够逃避警察的追捕，是因为他们对秘密警察的无线电频率了如指掌，并能熟练地使用它来迷惑警察。

在卡扎尔政变和“刀斧手”抢劫杀人案件之前，政府于1973年3月颁布了石油企业国有化法令；同年9月，古巴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对不熟悉复兴党的统治方式的读者来说，这两个事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萨达姆·侯赛因在同年9月24日的讲话中，把古巴、智利同伊拉克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古巴突然变成了帝国主义，智利的帝国主义“潜藏势力”也甚嚣尘上。他说：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最终、尤其是在1972年认识到，伊拉克的革命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即“由秘密革命

到公开革命”阶段，而人们通常认为第三世界的革命正是处在这一阶段……

我们从许多客观证据中看出，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国家政策的基本方法感到震惊；同样，他们对古巴以前的做法也感到震惊……不管帝国主义者通过什么方式在伊拉克寻找藏身之处，它绝不能迫使我们革命退步或失败……一些人也许以为革命者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其实革命者有一双警惕而圆睁的眼睛。一旦革命者决定采取行动，粉碎反革命势力，他们就不会犹豫，无所畏惧，自始至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所听到读到的一切，包括最近发生的犯罪案件，都是对付革命、污染革命者心灵的新花招。这些犯罪不是人们想像的那种虐待狂式的刑事犯罪，而是革命的叛徒犯下的罪行。

那些投靠外国人的人是不可能逃脱惩罚的……这些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受外国人的利用和雇用进行犯罪活动。不过，我们不能低估我们的力量和思想，也不能忽视帝国主义的腐蚀。我们必须认识、了解并准确地监测帝国主义的动向，预测它的计划、兵力及其国内外的潜藏势力，并做好反击的准备。我们曾制订计划，统一思想和观念，动用秘密武装力量，终于使垄断公司在1973年3月1日低头认罪，接受了国有化政策。但要对付蓄谋已久的帝国主义，这些办法是不够的。我们知道，1972年，帝国主义者就对我们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措施感到震惊，他们必然重新分析形势，发起新的攻势。因此，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超出他们预料的力量。我们向全国爱国的弟兄们保证，……他们不可能像对付阿连德政

府那样使我们轻易就擒。

萨达姆的上述推论，显然是根据强大的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做出来的。当时，他对秘密警察的信任感有所降低。擦亮革命的“眼睛”、撕开敌人的伪装、做好反击的“准备”等只能是某种情报机关职能范围内的事。这篇讲话强调了复兴党已经“知道”的或者具有“客观证据”的东西。这些信息不可能来源于没有根据的言谈和抽象的思想分析，而是从准确地监测帝国主义的秘密活动及其在伊拉克的“潜藏势力”的机构得来的。只有为政治服务的警察情报系统才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萨达姆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密谋”、“阴谋”等概念，但他真正的目的是强调“叛国”一词的新意义。“叛国”一词具有非凡的魔力，它可以把“刀斧手”的谋杀活动同国外某机构联系起来，这样，其罪行就增加了不应该有的另一层意义。在一些包括复兴党统治前的伊拉克在内的国家里，叛国是一种比较具体的罪行，如向外国出卖国家机密、煽动政变、亵渎君主等。这类叛国罪往往通过法律程序审理，而且能够得到宽大的处理。

但现在，依照复兴党的说法，复兴主义的法律来源于“人民”和代表人民意愿的“革命”。他们这个新国家的使命也就是整个“阿拉伯民族”或“人民”的使命。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成了一个统一体。个人通过具体的行动来推翻这个整体越来越困难了，他只能反对这个整体的思想。在复兴主义者的心里，冒犯全体“人民”比老式的叛国罪更为严重。它像军事政变一样严重；军事政变攻击的对象是国家的权威领导阶层；而冒犯“人民”则动摇了领导阶层权力的基础。人们往往感到，冒犯“人民”的尊严比冒犯一个邪恶的政权更为严重。其它类型的

政府不会因为“刀斧手”及其团伙曾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把他们的凶杀案同叛国联系起来。这些罪犯应该以刑事罪而不是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是，这样的凶杀案引起了所有人的恐惧，人们越谈论它，就越感到恐惧。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复兴党必须找出导致恐惧的理由。这个理由必须能够最终证明复兴党的正确，而不会引起人民的攻击。萨达姆·侯赛因开始从信念而不是从愤世疾俗的意图出发，寻找这个理由。

他的讲话旨在使“叛国”概念更加含混不清、更加抽象。现在，人们对叛国罪的憎恨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同时，萨达姆又通过对“刀斧手”凶杀案的处理使叛国罪的严重性更加明显，更加具体。萨达姆的这种思想源于复兴主义的思想体系，也与 20 世纪的思想潮流相吻合。它们都起源于本世纪初的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萨达姆只是模仿者，不是创始人。他坚定不移地把这种思想传给伊拉克。更重要的是，他扩大了政治犯罪的范围，使它的意义更加含混、更加广泛，几乎到了包罗万象的程度。这是他的突出成就。在他的心目中，叛国罪是一种更大的、针对全体人民的犯罪，而不是狭义上的犯罪。一旦叛国罪具有这种含义，警察机构自然就成了一切政治机构的替代物。

翌年，复兴党的《政治报告》对卡扎尔绑架“政府官员”和秘密警察系统的官僚作风作了谴责，但谴责的调子比萨达姆讲话的调子温和一些。它没有过多地暴露事实真相，以免人们用目的论来解释这些事件。难道卡扎尔不是复兴党自己孕育的人物吗？《政治报告》中提到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老现象呢，还是新现象？卡扎尔事件和“刀斧手”杀人案难道就是同一类型的犯罪吗？一个人的亲信难道就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密友吗？